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己
信息 知识 观念 须时时更新

读者参考

丛书

38

中国人的聪明

◎成千上万的丈夫 ◎ IT时代的文科生

◎警惕中国黑社会向政治渗透

◎现在是花钱的好时机吗？

◎中国的城市歧视 ◎匈牙利风雨十年路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聪明/《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4

(读者参考丛书; 38/林雨主编)

ISBN 7-80668-011-X

I. 中...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77 号

中国人的聪明

读者参考丛书(38)

2001年4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梅川 洋叶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81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万

ISBN 7-80668-011-X/Z·2

定价:10.00元

读者参考丛书

(38)

中国人的聪明

目录

中国如何追赶美国	1
私营经济降低中国改革成本	5
让暴富阶层承担主要的改革成本	6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8
西部开发当务之急是移民	38
700 万美元:公关大手笔背后	10
匈牙利风雨十年路	14
绿卡,开门?	18
当前县委书记县长最关心的若干 热点问题	21
警惕中国黑社会向政治渗透	25
彩票:大千世界的“魔方”	28
股票期权制让你和企业利益紧密相连	32
国有股减持有望成主流	35
创业板与主板的对比分析	37
从 1400 元到 1 亿	39
炒股的三种境界	58
中国距离“信用经济”还有多远?	41
现在是花钱的好时机吗?	42
格林斯潘与家庭理财	231
黄华国:我怎样当上 Nasdaq 中国 首席代表	43
国防“高参”张召忠	46
痴迷的邓伟	51
丰子恺:耐得住细碎	52
普京的秘密	55

波塔宁：俄罗斯私有化造就的大亨	59
他将是下一位世界首富	67
中国婚姻大调查	70
给婚姻法提想法	72
成千上万的丈夫	73
夫妻是两只交叉的圆	76
我挚爱的女性	77
克林顿夫妇分手不离婚	80
周国平：超越尴尬	82
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84
危机中年	85
多年父子成兄弟	88
家的妙处	89
保持平常心	69
美是不需要化妆的	90
守卫高贵的途径	92
不设防	93
晒太阳	94
教育的真谛	95
中国文化与教育	97
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在起点领先	
却输在终点？	99
“三好生”评选制度要不要改？	101
大学八大变化趋势	104
学生作文严重“缺钙”	105
高考五科命题都要变	24

何谓“懂”音乐	106
文学世纪回望	110
编导们,这才是生活	111
痞子蔡带给我们什么?	114
好作家一定就是好人吗?	116
第六感觉:离最佳更近	117
虚实相生:从围棋说开去	119
宽带网:静悄悄的信息革命	122
网络改变艺术产业	127
印度 IT 教育从娃娃抓起	132
网络消费将成为常规消费	133
现代生物技术:开创人类生活新天地	134
20 世纪科技灾难反思	138
体育何为	143
全家一起 FUN 一下	148
精确打击:高技术战争的主旋律	149
未来战争什么样	150
西部大开发的环境忧思	153
长江开始上演淮河悲剧	156
黄河之水何处来?	158
刘源谈父亲生前的两个错误	160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161
营救沙俄皇族	165

遭遇美女	170
世界著名经典广告语欣赏	171
英国人的雅致人生	173
要黑一起黑	175
民主的常见玩法	179
法官袍的司法隐喻	176
性贿赂该治谁的罪	177
我国首例“五环标志”侵权案	180
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181
浅说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182
也说中国人的“聪明”	185
没有文化的城市像贫血	187
城市是一首诗	188
中国的城市歧视	189
城市建筑为何难觅经典	229
IT时代的文科生	192
聪明的脑袋会拐弯	196
章士钊:两岸关系的神秘信使	198
蒋家后代回来认祖归宗	205
影响台湾女人的7个台湾男人	207
香港要造海底城	137
加拿大风情	210
感受欧美文化	213
“软件之都”——爱尔兰的骄傲	217
物质文明与道德沦落 ——拉斯维加斯见闻	220

到这些国家做生意,哪些礼仪要牢记?	223
众神之都:墨西哥城	224
阿拉伯世界新女性	225
俄罗斯姓名趣谈	228
日本考古界惊爆丑闻	230
改革的四个层次	232
我国试行干部引咎辞职	232
信息业拉动国民经济走强	233
2003 年底前废止下岗制度	233
科技创新需要创新体制保证	233
“知识贫困”威胁中国	234
我国综合国力迈上 1 万亿美元台阶	131
中国将用法律手段控制人口性别比	234
西部将推行“生态家园富民计划”	234
中国专用汽车何以不惧 WTO	235
给降低关税后的进口汽车价格算一笔账	235
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	4
国企将从 146 个行业撤出	7
降低证券交易费用是趋势	17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启动	155
多开一些无药处方	36
排解不快乐利健康	174
慢跑防癌	236
睡眠赤字:现代人亚健康之“祸首”	236
当心你身边的“催老剂”	237
后天因素是诱发癌症的主因	238
科学家推出十种最好的食物	238
不要过分追求无菌状态	239
亚健康状态自测	239
把握好日常保健的时间	240

中国如何追赶美国

□胡鞍钢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继续追赶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指标方面的发展差距。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以更快的速度追赶美国,这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最发达的也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将构成 21 世纪中国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令人关注的重大事件。那么,在 21 世纪中国能否追赶美国?如果能够的话,追赶美国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如何追赶美国?在哪些方面是我们追赶美国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第一,中国将明显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98)按实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78 年中国 GDP 相当于美国 GDP 总量的 23.0%,到 1995 年上升为 52.0%,2000 年为 60.6%,进而在 2015 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那时中国人均 GDP 仍然大大低于美国,中国人均 GDP 由 1995 年相当于美国的 1/10 上升为 2015 年的 1/5,因而,缩小与美国人均 GDP 的差距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第二,中国将应优先缩小在人类发展指标(HDI)方面的相对差

距,这包括人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参与权。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统计,1975 年中国 HDI 指标相当于美国 HDI 指标水平的 60.2%,到 1997 年上升为 75%,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和北京已相当于美国 HDI 水平的 90%以上。这表明中国与美国在人类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要明显地小于在人均 GDP 水平之间的差距,因而中国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应优先缩小与人们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人类发展差距。我们估计到下个世纪 2020—2030 年中国的 HDI 指标应达到美国 HDI 指标水平的 90%以上,人均预期寿命由目前的 71 岁提高到 75—77 岁(1994 年高收入国家为 77 岁,1997 年美国为 76.7 岁),成人识字率由目前的 83%提高到 95%以上(目前发达国家为 95%以上,美国为 99.0%),15 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由目前的 6 年提高到 10 年(目前发达国家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为 10 年,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已接近 10 年)。到那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5—16 亿人,即在人均中等收入水平条件下以及人均能源消耗量相对较低(目前中

国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仅为美国人均量的 8.9%)的条件下,享有更高的物质生活质量,更全面的人类发展,更有保障的人类安全,更优美的生态环境,并进一步消除绝对贫困人口,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中国应重点缩小与美国在知识、教育、信息方面的差距,这有助于缩小与美国的发展差距和人类发展差距。过去 20 年是中国在主要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美国的过程,例如谷物、肉类、水产品、水果、煤炭、钢、化肥等产量都不同程度地高于美国,在电力生产和汽车产量方面还明显地低于美国。中国与美国在知识与信息方面的差距十分悬殊,中国 SCI(指国际科学索引)数相当于美国的 45%;中国居民专利申请数不足美国 8%;K&D 支出为美国总数的 13.1%;高技术出口额为美国总数的 3.5%。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十分低下,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电话主线仅相当于美国的 61.8%;移动电话相当于美国的 42%;个人电脑为 3.8%;因特网用户为 4.6%;电子商务交易额仅为美国的 0.23%。中国成人识字率比美国低 16.1 个百分点;中国综合入学率比美国低 30 个百分点。中国与美国的教育差距既小于人均 GDP 差距,也小于科技差距和信息差距。21 世纪中国追赶美国的战

略实质是知识促进发展战略,首先是扩大中国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能力,特别是获取美国的知识与技术,提高中国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能力。其次是扩大广大公民吸取知识的能力,普及全民 9 年义务教育,积极推进 12 年中等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远程教育;再有扩大广大公民传播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至少使城市电话、移动电话、因特网、电脑普及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指标方面,我们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差距,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缩小与美国的三大差距(知识差距、教育差距、信息差距)需要调整政府投资方向,从竞争性投资转向非竞争性投资,从硬件投资转向软件投资。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为 42%,大大高于美国 18%的水平,但大部分属于硬件(厂房与设备)投资,而软件(指 R&D、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机构等)投资占 GDP 比重明显偏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未来几十年中国政府需要大幅度提高对软件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例如:教育投资、R&D 投资、卫生医疗与全民健康和社会保障的投资、计划生育与人类生殖健康的投资等。

第四,中国需要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并作为长期发展扩大国内投资需求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国国土面积大

于美国国土的面积,但是铺设公路里程只有美国总数的7.3%,铁路里程为27.4%,输油管道为3.5%,输气管道为2.8%;中国仅相当于美国航空运输市场的9.1%,登记的汽车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5.3%。今后20年应当是中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黄金时期”,这包括加速发展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航道与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业,从而构成未来中国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产生巨大的基础设施设备的进口需求。

第五,中国需要加速服务社会化进程,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把服务业作为未来新增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重要来源。目前中国服务业占就业总数比重不足30%,而美国这一比重高达70%以上,其中美国女性劳动力占服务业比重为84%,而中国女性比重只有11%;1997年美国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人数相当于中国同一行业人数的3.7倍;美国社会服务及个人服务业就业人数相当于中国1.5倍;虽然中国的人文历史十分悠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1998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仅相当于美国总数的17%;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美国,但是股票市值仅相当于美国的9%。

发展服务业的主要思路,是打破少数国有经济部门的长期垄断,取消高度保护,引入竞争机制,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我们把它称

之为政府的政策投入,而不是投资投入。

第六,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城市化率水平的差距。未来50年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2%,美国高达70%。如果中国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个日本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如果中国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个美国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这不仅创造巨大的私人消费需求,而且创造巨大的城市基础设备消费需求,即使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50%,仍然低于那时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追赶美国,并不是以美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这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国情差异甚大,也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通过中美两国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两国现代化指标的差异性,又可以寻找缩小两国现代化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例如积极引进技术发明国的技术和装备,而引进技术成本又大大低于技术创新成本,有可能直接采用国际最新适用性技术,并跨越某些技术发展阶段。当前,世界已进入了知识爆炸性增长和迅速扩散的时代,信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与信息、利用知识与信息、传播知识与信

息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知识与信息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改革要素。当今世界,一国或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上的优势不再是永远的优势,而知识以及提高自己的知识潜力,即动态比较优势才是发展的关键,这使得中国有着极大的机遇发展得更快些,进一步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断缩小与他们之间的发展差距。

知识促进发展是 21 世纪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其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知识发展,投资于人民,投资于知识,旨在优先缩小两大类知识差距,一是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

距,二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着眼于扩大全体公民吸收知识、传播知识、利用知识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一项战略性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突破、关键性技术发明、科学知识的普及,都会比小国产生出巨大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和外溢效应。为此,中国 21 世纪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实质是加速知识与技术追赶过程。这一过程还有赖于经济开放程度大小,开放程度越大,吸收外部知识与技术能力就愈强,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愈明显,进而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愈强,追赶的进程就越快。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将成为全球 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

美国波音民机集团副总裁总兰迪·贝斯勒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进入 21 世纪,中国航空运输业将继续高速发展,国内航空市场的年均增长率将超过 9%。未来 20 年内,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场。

贝斯勒说,波音公司预测,未来 20 年,世界航空客运年增长率为 4.8%、货运为 6.4%,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到 2019 年,中国将拥有 2200 多架客机,占全球机队的 10% 以上,机队

规模是现在的 4 倍,将新增飞机 1790 架。未来 20 年内,中国民用喷气飞机市场的价值将达到 1370 亿美元。据了解,目前中国共有 499 架喷气机,其中 348 架是波音飞机,波音飞机占中国民机市场份额的 70%。

贝斯勒指出,西部大开发将促进中国西部航空业的发展,地方机场将拥有更多航线和更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空运网的成熟,地方机场将利用小型飞机占据更大的航线百分比。小型单通道支线客机将成为未来中国航空市场的主要机型。

(摘自《光明日报》)

首份有关中国私企的国际调查报告

私营经济降低中国改革成本

□陈铁源

最近,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集团所属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作出了一个调研报告——《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据说,这是“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国际性调查报告”。该报告是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邵若素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及其带领的考察小组,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协助下完成的。考察组就中国私营企业的结构、私营企业所处环境及其融资机会等三大方面,在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四大地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

调研活动历时 16 个月,有 338 家私企的总裁接受了采访。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有以下 3 点:

第一,中国私营企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结果;第二,私营企业在产值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改善融资环境是私营企业面临的关键挑战。

报告认为,中国新兴私营企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

1978 年至 1983 年是中国私企的复出阶段。当时私营部门仅局限在“制度真空中发展起来的个体户的范围”,具有强烈的试验色彩,政府的本意是让私营部门扮演“边际

的、填补空缺的角色”。

1984 年至 1992 年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阶段;1993 年至今,是中国整体改革思路和官方对私营部门转变看法的时期,比如: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产权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中央提出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等至关重要的有关私营企业的新说法,都产生在这个时期。

IFC 的报告显示,私营部门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截至 1997 年,私营部门的员工总数达到了 6790 万人。截至 1999 年 6 月,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达 130 万家,注册资本总额达 8177 亿元。

IFC 东亚和太平洋局局长说:“私营部门在刚出现时,只被允许在(中国)经济的边缘上运行,而现在它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并被官方确定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成果”,私营经济为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拓展了非常重要的渠道,并成为国有企业艰难改革的催化剂,进而大大减轻了中国总体改革的社会成本。

让暴富阶层承担主要的改革成本

□杨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收入分配有几个方面:

第一,单位正式收入。包括工资、奖励,奖金又包括货币和实物两种。

第二,单位福利。一部分是单位所负责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住房和公费医疗;其他如汽车、微机、手机、旅游、出国、培训等等。随着各单位收入差距拉开,这部分收入相差越来越悬殊,当然这些主要是为单位领导人支配和享用。如果是权力单位利用权力得到的,就具有灰色收入性质。

第三,第二职业。个人单位之外的兼职所得。

第四,灰色收入。指那些法律规定不清,难以区分其合法性的收入。比如在商业、采购、广告、贷款、报道、发稿、评审等活动中,凡是有“审批权”的地方,都有为了得到批准,或者为了尽快得到批准,得到有

利于自己的政策,而广泛进行的“寻租”活动。其手法灵活多样,除传统的回扣和请客送礼外,早已经变本加厉,如邀请出国考察,安排子女亲属出国留学或者到关键单位关键岗位等等。

第五,实际消费。如领导干部异地任职,一个人住一个楼是普遍的事,在行政开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余各项如在执行公务、出国、调查研究、检查评比中的实际开销、超标住房等,数额应该比货币形态更为巨大。

上述的收入和实际享受究竟有多少,虽然我们难以统计,但这并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可以不研究。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的“模糊”,又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所以才需要下功夫研究。

消费需求不足使人们发出越来越多疑问: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银行里不是有6万亿居民存款吗?

有专家指出,尽管中国在对待私营企业的政策、法律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其速度远远跟不上私营企业本身发展的速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本身也面临很多不利因素:

比如私营部门的经营很不规范,企业的实际经营与其名义上的要求明显不符等。因此,目前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的私企的活动一直都“比较低调”。

(摘自《青年参考》)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支出增加，老百姓有钱不愿花。人们进一步提问：老百姓究竟是有钱不消费，还是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中国的财富分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1998年8月份，财政部副部长高强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答记者问，解释对居民存款征收所得税一事时说，据我们估计，10%的居民占有66%的存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加上股票、房地产和外逃的2000亿美元，中国两极分化严重得惊人。

近年来许多农民收入的增加，其实是卖不出去的粮食和其他剩余的农产品库存的增加，农民的需求并没有增加。

严重的是不同地区农村收入差别显著，沿海地区与内地农村人均收入差别达到80%。6亿农民在近12年可比货币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了7块钱，相当于沿海农民货币收入增长的1/50。半数以上农民收入下降，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基本原因。

中国改革之所以难度增大，主要是因为1995年以来，农民收入下降和工人下岗，已经不符合经济学家称之为“帕累托最优”的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少数人暴富没有关系，只要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没有绝对下降。这实际是社会可以容忍的底线。底线被突破，说明我国必须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否则不仅有悖于社会

公正，而且也不会有效率—居民缺少购买力，企业如何赚钱？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改革成本不能再向居民转嫁，应该首先由国家财政承担下来，然后由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按照其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来承担。很明显，国家应该通过打击腐败，实行实名财产（存款、股票、房地产）制度，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让暴富阶层承担主要的改革成本。

（摘自《中国信息报》）

国企将从146个行业撤出

国家统计局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说，在196个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应逐步从146个行业撤离，在35个行业保持一定控制，在15个行业中居于垄断地位。

该报告提出，应逐步撤离的146个一般性竞争行业，包括服装、纺织、食品、饮料业、日用品等行业。国有经济无须垄断经营，但应保持一定控制力的35个行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比较重要的自然产业如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二是关系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航天、新兴材料、计算机技术、生物医药等；三是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的支柱产业，如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等。必须由国有经济垄断或以垄断为主的行业有15个，如军工、电力等。

（摘自《文汇报》钟欣文）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樊 纲

反腐倡廉反复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现在也该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对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多作些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对策。

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所谓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

这种“以公权谋私利”的行为,当然首先与用人体制相关。

其次,“以公权谋私利”之所以泛滥开来,显然与法制不健全有关。

但是,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就会发现:选人、监督与执法等反腐败的活动,都是有成本的,而不是可以“免费”获取的。就“监督与执法”而论,所涉及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过程所需的费用,维持立法与执法机构的费用,监督费用,调查案件的费用,公众个人举报揭发所需的时间与费用等等。当然反腐败也是有收益的,直接的收益是收回了“赃款赃物”,间接的收益首先是有利于消除“民愤”,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并因此而使经济得以更快地增长。

反腐败行为的另一间接收益是

它的“杀一儆百”效应。这是因为,对于搞腐败的人来说,也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搞腐败的收益自然就是贪污、受贿、收“好处费”等等以公权谋私利行为中所占的各种便宜,而“腐败的成本”则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第一,是被抓住后所受的处罚。腐败一旦被抓住后所处罚越重,腐败的成本就越大。

第二,就是反腐败、反腐败制度的严肃程度。制度越严,为此而进行的宣传、监督、调查、追踪等行动越是频繁、越是认真、越是有效,腐败“被抓住的可能性”就越大,搞腐败时预期的成本损失就越大。

就是抓住腐败一定严惩,但是如果不去抓,或是因太多而“抓不过来”,或是大家司空见惯,谁也不抓,没有监督,没有调查,或是官官相护,有人举报也没人去抓,甚至举报的人反倒会受到惩罚,搞腐败的“被抓住”的可能性事实上等于0或近乎于0,腐败的成本事实上也就还是等于0或近乎于0。

可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腐败行为被抓住的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问题在于,“被抓住的可能

性”，在理论上是一个“概率”，这不仅取决于你监督了多少、抓了多少，还取决于在一定条件下有多少人“需要被监督”——理论概率，只是“受监督的人数”除以“有条件犯罪因此需要被监督的人数”而得出的一个比率。所以，要研究腐败的成本和防腐败的有效性问题，还要研究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这个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恰恰在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了一点。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产、供给与分配，“公共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决定”的事情，“计划分配”的事情太多，进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人数太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是一种使用“公共财产”的机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是一种“政府官员”，而且在一些问题是距钱和物“更近”的官员；并且，国有企业的职工，无论是售货员还是司机还是装电话的，也都是使用国家财产工作的人，也可能进行某种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如此众多的掌握着某种公权的人们进行监督与执法所遇的困难显然太大，防止腐败、消除腐败、“杜绝”腐败的成本显然很高，通过有效的监督来保证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就很难做到，以至根本监

督不过来、抓不过来，一不留神就会弄到“法不责众”的地步。打个比方说，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也能凭借公权“开后门”，国有企业看仓库的也能凭借公权收贿赂，你得花多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健全法制”？在一个有10倍的事情要由政府决定、10倍的物品要由政府分配、10倍的资金由政府官员掌握的经济社会中，“高薪养廉”所需的费用，“廉政公署”所需的规模，至少也要大10倍，才能换取一个同等的“廉洁程度”。即使我们假定一切反腐败的努力本身都是有净收益、净回报的，一个社会把那么多的资源配置在反腐败这个用途上，也是件很不经济的事情。

由此而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里，之所以腐败现象多，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私心的人多（本来就是这么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当然不是说已经健全了，而是说相对于要监督的对象的数目来说健全起来太难了），而在于“公权”存在的场合太多了。因此，要想把我们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清除腐败，根本的办法不是“严打”，也不是宣传教育（不是说这些完全不起作用），而是改一改体制。